

● 严其林 著

镇江进士研究

作为第一部对镇江地区古代科举、进士及进士家族进行系统性研究的专著，本著除梳理及考析自隋唐至明清镇江进士（包括武进士及清代驻防旗籍进士）外，还系统研究了以进士、举人为主要代表的镇江科举家族。此外，对古代镇江地区的进士群体作了多角度的区域性比较研究。



● 严其林 著

镇江进士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镇江进士研究/严其林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309-10818-7

I. 镇… II. 严… III. 进士-研究-镇江市 IV. D691.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8840 号



镇江进士研究

严其林 著

责任编辑/杜怡顺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9.25 字数 475 千

201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818-7/D · 686

定价: 5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葛剑雄

在科举制度废除一百周年时,我对科举制度作过这样的评价:

从隋唐到清末,中国的科举制度存在了一千多年。此期间无论政权如何更迭,包括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开科取士的做法却一直没有改变。中国的人口从五六千万增加到四亿多,疆域范围由数百万平方公里扩展到超过千万,科举制度的具体方法和名额不无改变,基本原则却一仍其旧。科举制度不仅在中原王朝长期延续,还影响到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推行到朝鲜、越南等藩属国。

任何制度的合理性都是相对的,科举也不例外,所以我们今天要评论其优劣,不能脱离中国历史的实际,更不能无视其产生和发展的背景。

在科举制度产生和实行之前,人才的选拔有两种主要的办法:一是世袭等级制,一是举荐制。前者规定某些职位是世袭的,只须能由担任该职位者的男性后代继承。这类职位范围很广,既有自天子、诸侯王、贵族等君主和统治者,也包括一些专业性强的官职,如太史,司马迁即继承了其父司马谈的太史职位。其他职位也只在特定的阶级或阶层中选拔,如魏晋开始实行的“九品中正制”和此后逐渐形成的高门世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使大多数重要职位只能在出身特定家族的人中挑选。在公共教育几乎不存在的时代,为了一些专业知识、特别是口耳相传的知识和技能的传承,对诸如天文、档案、史料、礼仪、艺术等方面的职位实行世袭不失为一种有效措施,但同

时也剥夺了其他更合适的人才的机会。政治上的垄断则对社会的正常运作与进步毫无积极作用可言,只是能维持某些特权家族与阶层的利益。

举荐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世袭制的局限,但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弊病。且不说在专制集权制度下必然出现的腐败,如政治权力的干预甚至逼迫、钱财的贿赂、人情的影响等造成的营私舞弊,即使当事人完全出于公心,也还有两个无法克服的不利因素。第一是个人的接触和了解范围毕竟有限,但为了对自己的推荐负责,他只能在这范围内提出。而有举荐权的人只是一部分官员、贵族、名流,能获得他们举荐的人自然少而又少。虽然偶尔也允许个人自荐,但草民百姓的自荐一般很难通过各级地方官的筛选,能够上达天听的真是凤毛麟角。第二是缺乏统一的标准,推荐者只能根据自己的感觉。而推荐者本人的水准、判断能力和选择标准相差悬殊,其结果也可想而知。

正因为如此,科举制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首先是打破了世袭制和等级制的垄断,除了少数受限制的家庭出身者外,无论贫富贵贱,都有参加考试的资格;其次是标准一致,各级考试都有统一的程序、形式和内容,即使主考官免不了个人好恶,也已受到很大制约;再则,随着科举制越来越受到重视,制度日趋严密,其中不少做法实际沿用至今,甚至比今天的规则严密得多。尽管科举制难免也有缺点,但在当时条件下,还能找到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科举制最受诟病的,一是遗漏了不少人才,二是考试内容毫无实际意义,三是耗读书人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对这些需要具体分析,全面认识。说到遗漏人才,我们的确可以举出一些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往往在科举中落第。但科举的目的是为选拔官员,并非选拔社会的各类人才。有些人虽有其他方面的才能,却未必适合当官员,考不上科举倒是很正常的。如李

白,无疑是旷世奇才、天才诗人,但从他对韩荆州的谄媚和接受永王李璘之召的轻率态度看,他肯定不适合当官。所以他考不上科举既不是坏事,也不能证明科举埋没人才,倒是成就了一代诗人。反之,由科举入仕的人中虽不乏庸庸碌碌之辈,但对中国历史起重大作用的人物大多也在其中。至于其中出现奸佞,与科举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选择标准中本来就只凭考试成绩,对未来的奸佞是无法识别的。第二点也是任何考试所无法避免的,因为考试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在于对考生打分排序,所以必须有一套通用的程式,便于不同的考官之间有比较共同的标准,八股文正是这些需求的产物。科举制本来就是中国的文化和社会价值取向的产物,决定读书人对科举制度态度的是传统文化和价值取向,而不是科举制度本身,不能本末倒置,以果为因。在科举制度实行之前,读书人在干什么?难道主要是在从事科研、管理、文艺创作或生产劳动吗?①

对这样一项影响中国一千多年的制度,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不是太多了,而是还不够,特别是还缺乏客观的、深入的、具体的研究。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看,还缺乏对该制度的地域性差异的研究。因为在任何时代,在科举制度实施的范围内(并非全国),始终存在着显著的地域性差异。这种差异既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差异的产物,反过来也影响当地的各方面,或者缩小这些差异,或者扩大这些差异,或者产生全国的影响,至少产生局部的影响。

研究科举制度的地域性差异,一个重要途径是研究各个行政区的进士(含三鼎甲)的差异。因为进士以下的举人、秀才的名额主要是按行政区分配的,而进士是在全国范围内竞争的。除个别

① 葛剑雄《科举制度:存废皆有理》,原载《新京报》2005年9月9日,第C2版“科举百年祭”。

特殊现象,一般都是根据统一的标准挑选出来的。所以进士数量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一个地方的教育、文化、人才、经济、政治、民风、传统等各方面的状况。这种研究的前提是必要的地域性史料——不仅要有所研究的政区本身的史料,而且要有周围其他政区的史料以及相应的全国性史料,这样才能对该区域作深入研究,并能与周围区域作出比较,并分析它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这类史料主要保存在地方志、地方史和当地人的记载中,同样存在着悬殊的地域性差异。

所以,严其林先生以镇江的进士作为研究对象是恰当的选择。在传世的为数不多的宋元方志中,镇江拥有两种——《嘉定镇江志》(南宋)和《至顺镇江志》(元),可谓得天独厚。其他地方志、地方史和相关记载也堪称丰富。加上严先生长期在镇江工作,一直留意乡邦文献,并陆续有论著问世。而且镇江的科举和政治、经济、文化的进程在时间和空间变化上也有其典型性,在时间上有过盛衰起伏,在地域上经常属发达地区,却往往处于边缘,既有经常性的有利因素,也有阶段性的不利因素。这样的研究成果尽管主要是地域性的,却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严其林先生是我的学长,虽然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时他已毕业离校,但早在2000年就读过他所著《京口文化》,并遵嘱为此书写过序言。现在又读到其林先生的新著,对他长期致力于乡土历史文化研究的不懈追求和取得的学术成就十分钦佩。现在在历史和历史地理专业的毕业生往往以不能留在高校或科研机构为憾,或者从此放弃了专业研究,这是很可惜的。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外固然会有资料、时间、研讨等方面的困难,但也可能有自主、自由、就近调查和搜集地方性史料包括口碑材料、更容易获得地方的支持等方面的优势。只要选题得当,持之以恒,同样可以取得重要的研究成果,而且能弥补专业研究人员的不足。其林先生的经历和成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和吸引力的例子。其林先生有长期积累的丰富资料和经验,我们有理由期待他的新著。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隋唐润州进士	1
一、隋唐科举制度的确立	1
二、隋唐润州科举背景	4
三、历代方志所列唐五代润州进士	12
四、隋唐润州进士考析	14
五、润州、昇州合分统计比较	26
六、唐代润州进士中的名臣与名诗人	31
第二章 宋元镇江进士	42
一、宋代科举制的完善	45
二、两宋镇江进士数考析	52
三、北宋润州进士	64
四、南宋镇江府进士	94
五、宋代进士群体特点及外籍名进士	120
六、元代镇江路进士	127
第三章 明代镇江进士	130
一、明代科考与镇江	131
二、明代非进士授职	141
三、明代镇江府进士	153
四、祖籍镇江府进士及外籍名进士	207

第四章 清代镇江进士	215
一、清代科考与镇江	216
二、清代镇江府进士	226
三、清前期顺治—雍正溧阳进士简表	296
四、清代非进士的授职入仕	299
第五章 武举与清代驻防旗籍进士	310
一、镇江武进士	310
二、清代京口驻防旗籍进士	335
第六章 今镇江地区句容进士	346
一、唐宋元句容进士	347
二、明代句容进士	356
三、清代句容进士	369
四、句容志书中多收的明清进士	375
五、句容武进士、武举人	384
第七章 镇江科举家族	390
一、唐宋润州科举家族	391
二、明清镇江科举家族(上)	395
三、明清镇江科举家族(下)	447
第八章 学校教育与科举生活	466
一、明清学校教育与科举	466
二、十年寒窗苦读生涯	473
三、科考幕后的贤妻寡母	483
四、传胪、刻碑、建坊、重宴、重游	487
五、科场风波与镇江士子	498

第九章 镇江进士比较研究	508
一、明清镇江府辖县进士数及鼎甲数分布	510
二、明清镇江府进士数在区域中的排名	520
三、明清镇江府进士数在全国的排名	527
四、明清鼎甲进士数比较	528
五、《明史》、《清史稿》中立传的镇江进士	534
六、明清镇江进士文化成果及区域比较	543
附录	565
附录一 今存南宋绍兴十八年及宝祐四年登科录中 镇江府进士榜次	565
附录二 清代镇江进士硃卷样式	567
附录三 镇江科举家族谱系、谱序、墓志铭等掠影	569
附录四 清代硃卷中进士履历、家世、名次等记录	571
附录五 明清镇江府进士巍科及乡试解元简表	573
附录六 今镇江地区进士简表	576
主要参考书目	599
后记	606

第一章 隋唐润州进士

科举制度是封建王朝通过公开考试来选拔任用官吏的制度,创始于隋朝,成型、健全于唐朝,延及清末,前后存在将近一千三百年,远远超过一个强盛王朝的寿限。隋唐时设科考试的取仕科目多达数种,而以进士科最重要。至明代时取仕只余进士一科,进士及第成为读书士子奋斗一生的梦想,也是衡量地方人才产出的主要标准。

一、隋唐科举制度的确立

隋初,隋文帝废除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用分科考试来选拔人才,打破了门第限制。隋炀帝时在传统的明经、秀才等科目外,新设以考文辞为主的进士科,进士之名由此而始。唐赵彦在《登科记叙》中说:“进士者,谓可进而授之爵禄也。”《通典》称:“炀帝始建进士科。”^①《新唐书》也记:“进士科起于隋大业中。”^②不过,隋代科举作为新的取仕制度尚未完备,进士一科更未彰显。

唐代,分科选仕制度逐步建立。一是考试科目(专业)增加,常科考取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录取范围扩大;二是考试定期举行,基本上每年一试。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各州考生二百余人集京师长安,参加由吏部主持的首次考试,内进士科录取4人(一说14人^③),以孙伏伽为首科状元。唐太宗即位后修文偃武,在贞观二十三年中开科21次(贞观二年及十六年未贡举),内进士科录取数计205人。继后执政的武则天、唐玄宗为

① [唐]杜佑《通典》卷十四。

② 《新唐书·选举志(上)》。

③ [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一,武德五年条注:“《掖言》作进士十四人,《登科记》作进士四人。……四人与十四人,未知孰是。”

扩大统治基础,对科举取仕更是大力推崇,并作为选才用人的基本国策而确立下来。陈寅恪就此曾作过精辟分析:“自武则天专政破格用人后,外延之显贵多为以文学特见拔擢之人。而玄宗御宇,开元为极盛之世,其名臣大抵为武后所奖用者。及代宗大历时常袞当国,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自德宗以后,其宰相大抵皆由当日文章之士由翰林学士升任者也。……可知进士之科虽设于隋代,而其特见尊重,以为全国人民出任之唯一正途,实始于唐高宗之代,即武曌专政之时。及至玄宗,其局势遂成凝定,迄于后代,因而不改。”^①

唐代取仕科目中以明经、进士两科最为重要,明经科以贴经为主,全赖诵记;进士科则考诗赋及时务策,又以诗赋为主,主要比才学,加之录取比例小,难度很大。《唐摭言》称:“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搢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②据清人徐松所考,唐进士录取数每科约30人为常,录取率百分之一二,而明经录取数每科十倍于进士数,录取率约十分之一二,即以今人眼光看明经的录取率也不算高的,而被录取的进士更是凤毛麟角。是故,《新唐书·选举志》称:“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

唐代科考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至玄宗开元末改由礼部侍郎主持。进士科的考试内容唐初沿袭隋代,主要考时务策(策文),至唐高宗时加试帖经和杂文。杂文初有箴、铭、论、表之类,其后渐用诗赋,到玄宗天宝年间杂文专考诗赋。唐时每年十月,各地贡举齐集京师,于来年初参加统一考试,考试结果张榜公布。武则天、唐玄宗还曾亲自策试应考的举子,但殿试在唐代尚未制度化。

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② 王定保《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

唐代应试的举子都要向主考部门呈递本人身份的名状,因此被录取的第一名便称“状头”,雅称状元。唐代进士录取尚未分三甲,更未经殿试裁定,因此唐时状元不如宋代及明清那样显耀。此外,唐代士子考中进士后还需经吏部的“释褐试”才得被授以官职,故进士及第还只是取得入仕的资格。不过其后“位极人臣常十有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①,成为不争事实。随着封建统治基础的扩大,有唐一代进士热方兴未艾,如唐《国史补》中所描述:

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实集其中。由此出者终身为闻人,故争名常切而为俗亦弊。其都会,谓之举场。通称,谓之秀才。投刺,谓之乡贡。得第,谓之前进士。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有司,谓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谓之等第。外府不试而贡者,谓之拔解。将试各相保任,谓之合保。群居而赋,谓之私试。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还往。既捷,列书其姓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会。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籍而入选,谓之春关。不捷而醉饱,谓之打氍毹。匿名造谤,谓之无名子。退而肄业,谓之过夏。执业而出,谓之夏课。挟藏入试,谓之书策。此是大略也。^②

唐代取士除常科外,还有制科。《新唐书·选举志》:“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而天子又自诏四方德行、才能、文学之士,或高蹈幽隐与其不能自达者,下至军谋将略、翹关拔山、绝艺奇伎莫不兼取。……而宏材伟论非常之人亦时出于其间,不为无得也。”其后两宋明清历朝相同,但制举只是常选的一种补充,其地位与影响无法与进士常选相提并论。

^{①②}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

二、隋唐润州科举背景

隋唐时镇江称润州,位于长江下游南岸的宁镇山脉与茅山山脉交接处,地属吴头楚尾,曾是吴文化的起源地之一。秦汉时在今镇江地区先后设置江乘县、丹徒县、曲阿(丹阳)县及句容县,则其地有县级行政单位的历史已有二千二百年。开发虽早,但因境内多丘陵岗地,经济文化面貌比较落后,所谓“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①、“江南卑湿,丈夫多夭”^②。镇江发迹于汉末吴初,崛起于六朝(东吴、东晋、宋、齐、梁、陈)。东汉末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始自吴迁于京口而镇之”;“十四年,权居京口”^③。京口即今镇江城区,本丹徒县之西乡地,吴主孙权于赤壁大战前夕将其军府由吴(苏州)迁京(镇江),随之孙刘联军在赤壁大败曹军。第二年(建安十四年,即209年),刘备“至京见权”,进一步巩固了孙刘联盟。自后京口声名鹊起,成为三国名城。但境内地旷人稀、“田多秽恶”的落后面貌还未得到大的改善,直至东晋、南朝时镇江地区成为南下流民的集中地之一,大规模开发得以开始。西晋末北方战乱,民族仇杀,中原百姓举族南徙,史称永嘉(307—313年)南迁。河北、山东及徐州一带的流人徙居京口及以京口为郡治的晋陵郡各县者为数众多。如河北幽州流民领袖祖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继“居丹徒之京口”^④,其后又从亲党、部曲中挑选出百余家自京口江面渡水北伐,未随征的就留在了京口、建康一带。再如山东兖州流民领袖郗鉴南下后于东晋咸和(326—334年)初率部参加平定苏峻之乱,“遂城京口”,直至病故。

① 《史记·货殖列传》。

② 《隋书·食货志》。

③ 许嵩《建康实录》卷一。

④ 《晋书·祖逖传》。

南朝宋武帝刘裕祖籍徐州彭城,高祖刘旭孙、曾祖刘混。《宋书》上记“旭孙生混,始过江,居晋陵郡丹徒县之京口里”^①。而齐高帝萧道成及梁武帝萧衍的祖籍都是山东兰陵县中都里,其高祖萧整于西晋末“过江居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②。东城里在今镇江之丹阳东北。东晋一朝,以京口为郡治的扬州晋陵郡成为南下移民的集中安置区,这给镇江地区的开发带来劳动力及先进生产技术。出于对土地的强烈要求,移民及后裔不断向丘陵川泽纵深进军,逐渐改变了长期以来地旷人稀的面貌。据《宋书·州郡志》记载,刘宋时南徐州(州治京口)下辖17郡、63县,计有户7万2千余、口42万余,仅次于州治建康的扬州,而高于南充、南豫、江、荆等州。下游的南徐州与上游的荆州是拱卫南方建康政权的两翼,地位举足轻重。经济增长带动文化发展,一时人文荟萃成为景观。谭其骧先生指出:“南徐州所接受之移民最杂,最多,而其后南朝杰出人才,亦多产于是区,则品质又最精。……南徐州之人才又多聚于京口。今试于列传中查之,则祖逖范阳道人,刘穆之东莞莒人,檀道济高平金乡人,刘粹沛郡萧人,孟怀玉平昌安丘人,向靖河内山阳人,刘康祖彭城吕人,诸葛璩琅琊阳都人,关康之河东扬人,皆侨居京口。”^③葛剑雄先生更说:镇江曾“因永嘉南迁的历史机遇而迎来一段数百年辉煌的京口时代”^④,这为其后唐宋时转型奠定了基础。但限于自身条件,宁镇地区的农业、养殖业与吴中地区还有明显差异。南朝顾野王《舆地志》载:“丹徒界内,土紧紧如蜡。谚云:‘生东吴,死丹徒’。言吴多产出,可以摄生自奉,丹徒地可以

① 《宋书·武帝本纪》。

② 《南史·齐高帝本纪》。

③ 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载《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④ 葛剑雄《京口与镇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8月26日。

葬。”^①可见六朝时吴中地区与宁镇地区的生产条件及经济状况差异明显。

隋唐大一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全面繁荣时期。隋唐镇江称润州,在六朝加快开发的基础上开始自身转型,从单一的军事重镇逐渐发展成为运河线上以工商业及交通运输业著称的城市,且在东南的地位一度举足轻重。促进这一转型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行政设置的变化,润州地位先降后升,一度代替金陵(今南京)在东南地区的军政地位。隋灭陈后,为消除六朝故都建康对南方的影响,曾将建康城平毁,将原设置于建康的扬州迁至江都,另于石头城置蒋州。隋统治者还废掉建康以东的以京口为治所的南徐州,分置润州(治京口)和常州(治武进)。旋又废润州,以丹徒地并入延陵县,与曲阿县一并辖于江北的江都郡。唐初,继续实行贬抑江南的政策,金陵地进而废州为县,始称白下,后称江宁。但为运作方便,复置润州,初领丹徒、曲阿两县。武德九年(626年)又以延陵县、句容县和白下县辖属润州。武后垂拱四年(688年)从延陵县析出金坛县,隶润州。如此在唐代大部分时间里润州辖有6县地,即丹徒县、丹阳县(天宝元年即742年改称曲阿为丹阳)、延陵县、金坛县、句容县、上元县(白下后称江宁,上元三年即761年再称上元)。今镇江地区及南京城区在唐代曾共归润州(州治京口)管辖,润州地位由降转升。唐政府曾于至德二载(757年)至上元二年(761年)及光启三年(887年)至天祐四年(907年)以宣州之溧水、溧阳及润州之上元、句容4县另置昇州,但两次前后总计只二十四年。是故《旧唐书·地理志》未列昇州,唐代其他重要典籍如《元和郡县图志》、《通典》(均成书于中唐,早于《旧唐书》)更是未列昇州。但《新唐书·地理志》单列昇州(辖领上元、句容、溧水、溧阳),这在本章后面将作分析。

^① [清]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

表 1-1 唐代润州行政区划

文献 州名	《元和郡县图志》 〔唐〕李吉甫	《通典》 〔唐〕杜佑	《旧唐书》 (五代)刘昫等	《新唐书》 (北宋)欧阳修等
润州	丹徒、丹阳、金坛、延陵、上元、句容	丹徒、丹阳、句容、江宁、延陵、金坛	丹徒、丹阳、延陵、上元、句容、金坛	丹徒、丹阳、金坛、延陵
昇州 ^①	(不载)	(不载)	(不载)	上元、句容、溧水、溧阳

据《新唐书》载,唐政府曾于乾元二年(759年)至元和二年(807年)在润州置有丹杨军,前后长达近五十年,是故唐、五代人亦称润州为丹杨(丹阳)。如唐《元和郡县图志》润州条名下注有丹阳二字,《新唐书·地理志》则称润州丹杨郡,都是一个意思。再如李白《永王东巡歌》之五:“丹阳北固是吴关,画出楼台云水间。千岩烽火连沧海,两岸旌旗绕碧山。”诗中的丹阳即指称润州,而非指润州之属县丹阳县。南宋《(嘉定)镇江志》就唐代润州为何又称丹杨郡(丹阳郡)作这样解释:“然自天宝元年改润曰丹杨郡何也?盖武德九年以后、至德二载以前,江宁、句容并属润州二县,即丹杨故地,天宝因为郡名,逮至德间割出润之江宁、句容、分以宣(州)之溧水、溧阳,建为昇州,自是丹杨之名虽存于润,要非昔之丹杨矣!”^②了解这些就不难理解唐代润州籍进士中何以“丹阳人”为多的原因。唐代还在州之上设置道一级的监察机构,开元时全国划为15道,润州属江南东道,理所当然先设于苏州,后设于润州。唐后期,全国被划为40余道,“每道皆置观察使,雄藩重镇则带节度使,不带节度使者则带都团练使或都防御使。它们虽仍是使职,实际上已经成为统领一道军政、民政、财政、司法等大权的

① 昇州设立前后两次,总计24年,即至德二载(757年)—上元二年(761年)及光启三年(887年)—天祐四年(907年)。

② 南宋《嘉定镇江志》卷一《地理》。